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

[美] 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 著
孙慕义 主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

[美] 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 著
孙慕义 主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4-66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美] 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著;孙慕义主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书名原文: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bioethics

ISBN 978-7-5161-5026-9

I. ①基… II. ①祁…②孙… III. ①生命伦理学—教材 IV. ①B82-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437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 帆

特约编辑 王 磊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戴 苑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9

字 数 613千字

定 价 8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作者与主译者合照

作者简介：

祁斯特拉姆 · 恩格尔哈特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1941 生，美国南方人，医学博士、哲学博士。早年曾执教于德州大学加尔维斯敦医学人文研究所，后担任美国莱斯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美国贝勒医学院医学系教授。并任贝勒医学院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职于莱斯大学，并任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和《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杂志主编。发表学术论文 250 余篇，出版专著与著作 25 部，与他人共同主编临床医学伦理丛书等。其中，《生命伦理学基础》、《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文主义》曾出版中文版。本书与其他几部专著，先后被译为意大利语、日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其学术思想与理论已经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

主译者简介：

孙慕义 1945 年生，哈尔滨人。从医 18 年后，1980 年代转向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人文学研究与教学，主要致力于生命伦理学的原理和原论以及基督教伦理神学的研究。为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专业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创办人；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前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医学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医学与哲学》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目前担任江苏省卫生法学会会长与江苏省医学伦理学会、医学哲学学会名誉会长；现为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席教授；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主编大型医学人文系列丛书，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出版《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后现代生命神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大法学》、《新生命伦理学》、《自由与善》(与他人合著)等 20 余部专著与著作。

总 序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立，90 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 90 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实现了博士化。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自 20 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很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2005 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 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

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在道德哲学的层面探讨和解决。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

2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

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

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东大伦理”取名于两种考虑：这些系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的成员，有的系列也包括东南大学培养的伦理学博士生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成果具有某种特色，以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东大伦理”由五个系列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系列；科技伦理研究系列；重大应用研究系列；与以上三个结构相关的译著系列；还有以丛刊形式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的《伦理研究》专辑系列，该丛刊同样围绕三大定位组稿和出版。

“道德哲学系列”的基本结构是“两史一论”。即道德哲学基本理论；中国道德哲学；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不仅在概念上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将伦理学、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相区分。这些区分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它更深刻地与中国道德哲学传统相契合。在这个被宣布“哲学终结”的时代，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学研究反倒是必须而稀缺的，虽然那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气象”在中国几乎已经一去不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学术已经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气魄。中国道德哲学史、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理念基础，是将道德哲学史当作“哲学的历史”，而不只是道德哲学“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它致力探索和发现中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的精神内涵，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专门史与通史，将是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纬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辩证法是其灵魂与方法。

“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

“重大应用系列”以目前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为起步，以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重点。目前我们正组织四个方面的大调查，即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大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趋向大调查。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努力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进和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意义和创新意义的对策思路。这就是我们对“重大应用”的诠释和理解，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贡献出团队和个人的研究成果。

“译著系列”、《伦理研究》丛刊，将围绕以上三个结构展开。我们试图进行的努力是：这两个系列将以学术交流，包括团队成员对国外著名大学、著名学术机构、著名学者的访问，以及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基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主题和主线，由此凝聚自己的资源和努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也许，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自己难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们这支团队的学术资质方面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我们期图通过漫漫兮求索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以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为三元色的“东大伦理”的学术标识。这个计划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某些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为中国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努力的抱

4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

负和愿望。我们无法预测结果，因为哲人罗素早就告诫，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诺的是：

我们正在努力！

我们将永远努力！

樊 浩

谨识于东南大学“舌在谷”

2007 年 2 月 11 日

译者序

生命伦理学,以圣言叙事与告诫

孙慕义

我们生活在人们对任何事物不再确信无疑的时刻,我们原本担忧的很多有关信仰的问题,真的全都发生了,所以,这个世界异常清醒,又异常困惑与混乱。因此,很多人幻想能够追回人类的那种虔诚与执着,逃离金钱与物质的桎梏,即使是游戏,也要有道义的限制;关于自由,不可以过度情感发泄,最危险的是,甚至使其成为我们身体存在的基础;因为毕竟,理性还静卧在我们身边喘息,并告慰或者警示我们:前面,可能就是生命的陷阱!

起初 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创世记 1: 1-2)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经 第一章)

事原本就是“空无”,但正是这一段从未有的空无,给了我们万有和以我们理想化上帝赐予的万能,何以使我们人类欲望达至我们预想的“至圣至善”,就是因我们所处的眼下这个人类世界,有时,太使我们失望和压抑,我们几乎没有在空无的时间与空间加添我们预想的物如与“自体”,我们本应该应该风华璀璨或者真善美的世界,显得如此遥不可及或几乎不可实现;我们本应该的振奋与高远的情志一直遭遇着阻遏或消解,超载的物质诱惑,为人类贪婪的本性或原始的罪性,浇注了燃点的油柱,星火来兮,无可常安。因此,被无神论者贬斥的宗教,竟然一

2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

时间，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点燃了人类又一种希望和期盼，那就是理性与信仰之火，这就是黑暗源面的万物之母，生命从来没有过的以其灵、其妙、其微、其圣道，以及其伦理之大义，为我们所永恒之求索。我们以从没有过的信心，能够承继源于“信望爱”原初生命的招叫、附丽于这生命伦理的精灵。

在此，我并不想过多地叙述我和我的学生们制作这部译稿的心路经历，或是专事表白为什么我坚持把这部沉静、艰涩、厚重的思想巨作介绍给我们中国的学界和读者；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当前太需要生命政治和身体伦理的学术精品，在我们以往走过的这段医学人文学历史过程中，我们很少有机会邂逅针对能称其为人类文化心语、格调高蹈、思想深刻、视界开敞的文化巨制；在这潦草的年代，可以以此使我们育成能够鉴别那些仅仅引起文化快感的学术垃圾的能力，以此抵制那些市井有毒的快餐，它们已经侵蚀我们曾经充满清纯和本真情愫的灵性家园。

作为思想、学术与情志的朋友，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是我在西方世界少有的知音并能够进行思想与情感对话的友人，我们交往有限，但那种心怡相连与文化偏爱，几乎使我们一见而如故交，不能忽略的当然是信仰的原因和人生境遇，以及家族传习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学术观念和学科的追求和共同的道德共识意识，如此方成就我们今天这一具体的项目与合作。他的整全道德理想与真全生活的祈盼，唯有如此深刻理解他内在世界指向的人，才可真诚地透悟并宣表他的希冀和愿景。

恩格尔哈特教授是当代美国乃至世界上具有超凡学术功力的、卓越的生命伦理学与哲学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是东正教神学家。长期以来，他贡献给我们近 20 部生命伦理学与哲学专著、著作和 200 余篇学术文章。他的睿智与学术穿透力，在生命伦理学界很难有人与其相比，也因此赢得了学术界普遍的赞誉，并已经足以作为当代世界医学人文学领域的主角。夫有志，当孝其才。我们这一代学人，其实已经遗失了前辈许多优秀的传统，仅对照清末民初，或是五四前后的学界先锋，都可说是一种倒退。核心是因为如此误会的学术文化体制和人性逐利的风尚，挤压了学术责任与知识界的基本信仰，我们常常在“我非我”的冲突中被灵与肉绞杀和搏斗吞噬；而我们这些人，如何在通过痛苦的

历练后回归于原初的那份天真和性本善的自我,可以学一下这部书,接受斯人的智慧和独到的点拨。我生自然还是我身自然,本为身自然、物自体,身物本色而人生可化之为超然。人应临世风道而勿戒本道,只有炼狱苦行后,才可皈依真理的本道,太多的诱惑与生命的杂陈,亚当之后漫长旅途的劳顿与怨怒,由此平息,圆我们最初的渺远的心愿,只是为,最后,无愧于我们的艰辛,无愧于我们的盼望,无愧于我们的信仰与圣爱。

现在我要说的是,本书显然深化了先在出版并已经在中国产生影响的那部《生命伦理学基础》,而且是一种智性的超越,那部书的开启是在20世纪70年代,写就于1995年;距离本书的写作整整跨越20余年,也就是说,作者从青年时期走过,随着世界后现代风云霍起,其学术和学科体系构思以及学术思想核心已经形成,并臻于成熟。因此,他以伦理神学(严格来说应为东方正教伦理神学)的角度,集合哲学、身体伦理、生命政治和医学的知识维度,对生命伦理问题,做了一个宏大的游览与审视。与前一部书不同的是,他已经寻找到了俗世生命伦理学尝试“整全道德生活”失败的原因,他终于还没有放弃他和他的同伴对于信仰的追求,和对于灵性的敬拜;也就是说,在这部以基督教神学解读的生命伦理问题的长途远行中,他以最后的“上帝”信念保留了自己作为基督徒的思维逻辑根基,并且排除了所有世俗的干预,返回了最初出发时的耶路撒冷城墙,虔诚地聆听以斯拉的声音。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哲学的解决途径和神学真理是协调一致的:真理就是那人(a Who)。这时期的神学是人们在苦修过程中,通过在上帝面前祷告忏悔而获得的。在这样的神学理念中,生命伦理学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只有接受邀请进入神的人才能获得生命伦理的知性。对于欲回应‘我怎样才能获知真理?’的人,首先要接受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在禁欲苦修中转变。这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最终,世俗道德无法解读明显自洽的、唯一的以及为理性所确证的道德文本。”他在对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以及克尔凯郭尔的主张的分析之后,认为:“世俗道德并不能替代宗教伦理去维持它自身不能维持的道德。世俗道德不能提供一种规范的世俗生命伦理学……”

4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

鉴于如是，我们中国的读者就将遭遇一个难以回避的“上帝问题”。上帝的概念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理解“上帝”，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个“神仙”、“天”、“佛”或“道”的对应，但这与西方的上帝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的上帝是与其民族血液成分融为一体，并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世俗生活，比如对于疾病、医疗、生殖或死亡问题的态度和选择。上帝问题不在仅仅囿于教会的灵性生活，而且在阿奎那之后，就成为哲学的一个部分，并将人类各种处境，作为上帝某种方式的、有指向的有效言说。这在瑞士神学家海因里希·奥特（Heinrich Ott）汲取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思想，创造了“位格有神论”的思辨语言之后，就使人们有了一个崭新的、富有存在哲学意蕴的关于上帝的理性认知，同时，对传统理智主义的自然神学与科学神学有了一个很好的接应；也针对后有神论、即“上帝已死”神学与“无神论宗教”，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圣经观，这种既非自然科学又区别于历史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解救了当代或后现代基督教的文化困境；建立在位格观念上的“对话神学”、“祈祷神学”，则帮助诸如恩格尔哈特这样的具有浓重宗教意识和情感的学者，厘清和梳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初步织筑体系化理论，并能够重新自如地游刃于哲学、宗教、科学和生命政治论之间，给我们以特殊的、合理的、自恰的理由，教我们无嫌疑地、睿智机敏地处理医学生活中诸多的复杂关系。尤其当我们深陷于两难的伦理窘境之中时，信仰和灵性就能够给我们以方向和解决具体伦理问题的美善、灵便的方法，我们则不必因认识的冲突，被仄逼进狭窄的悬崖幽谷，或承担道德的风险。

其次，本书的意义，我个人以为，不仅仅在于生命伦理学理论上的突破，开阔我们的学科视域，而且，将其理论和思想置于汉语文化语境中，可以使我们体味生命伦理学的神学核心本质和基督教转移基因的结构，帮助我们真实地进入西方生命伦理文化腹地，与西方学者进行深入的对话与交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中国文化中的神圣观念非常含糊和无力，表现在这种文化在历史中几乎从来无法感受到一种能与之进行真正对话的“他者”（见海因里希·奥特《上帝》，朱雁冰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作为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就有必要理解上帝这个概念，并能够回答出为什么恩教授坚持，在临床治

疗学中,宗教因素能够完成医疗技艺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通过宗教的感悟和体验,疾病才能获得完整的“治愈”。同时,我也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作为汉语文化圈一个新的生命伦理学时代的开始,并修正我们这些年来对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误读,改造我们的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活,澄清我们许多糊涂的学科观念,争取成为理智的、清明的学者;若能圆此愿,我想,这是最使人欣慰的结局。

具体说来,恩格尔哈特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是为了与世俗生命伦理学区别,提出这个用基督教神学解决生命科学技术难题的学科,它的两大部分构成是: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形成,学科地位,与世俗生命伦理学的平行关系,信仰、上帝等道德神学概念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影响,传统宗教伦理学和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关系;生命科学技术与基督教伦理学,用神学的视角研究生命、死亡以及生存状态等问题。当然,恩氏还没有与逻辑组合更加相关的全部理论,但他的思想已经臻于体系化,也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概念,除对于道德异乡人、允许原则等概念的续用外,他在本书中,还建立了道德共识意识、真全生活等;并对整全性道德予以极大的充实。

本书作者有渊博的知识背景,能够自如地驾驭经典的道德神学或伦理学语言,对于基督教思想历史和东北欧、南欧诸多民族的民俗与典故,信手拈来,令人折服。恩教授又是一位富有浪漫气质、翩翩风度的大学者,其文字与其演讲时激情四溢富有感召力的神采一样,每每冲击人的思想神经,尤其再加添东正教神学家传统的深邃冷寂的哲思,则更会给人以心灵的长久震撼。

普遍的哲思和把多态的世俗概念镶嵌在物质的世界中,并亲身参与凝视与反省;随后,冷静地思忖生命的基督教道德问题,概如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并且只有通过基督教的语言,我们才可以真正读懂他的思想与主张,以至于我们中国读者与生命伦理学界,将会通过此书,纠正视之为“极端的基督教伦理学成就”的观念。长期以来,对于汉语文化圈的生命伦理学学者们来说,始终认为恩氏不过是带有基督教情结的美国另类生命伦理学家,他的情感冲击力不过来自他的宗教情结以及才思和睿智,很少有人沉入进深层研究他

丰厚思想的成因。作为东正教虔诚的教徒，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研究不过是他信德行为的一部分，处于一种转移的信仰，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世俗的伦理学语言倾诉他对生命的爱和渴求；他爱这世上的人，他更爱他心中的那个“上帝”。因为没有基督化的语言训练，我们中国的学者、包括自认为他朋友的人，并不理解他的生命伦理学最后和道德神学本是同根生长的学问，那种内在的、隐藏的、压抑并随时等待释放的思想潮水本来源于他虔敬的基督教信仰，没有这种真诚的语言认知，将无法消化他的作品和演讲，尽管他到处受到很多人的奉迎。

译完此书，我更以为，用道德哲学和伦理神学的融合方法研究医学与生命科学问题的当代学者之中，应以恩格尔哈特为最重要的标识，他当之无愧为此领域的第一琴手。生命伦理学最后成形逾四十余年，极其缺乏毫无保留、勇往直前、同时不在意任何外在利益和权势威胁与诱惑的学者，没有基督教精神，这样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我们许多人在台上慷慨激昂，陈明自己通过舶来别人的思想与刚刚学到的观点，以为真的达到了生命伦理学的顶峰，并不允许不同意见的人提出与之不相符合的声音，那种霸道与幼稚，玷污了本属于基督神学的生命伦理学的圣洁与沉静。而恩氏的深邃的思想可以教诲这些人认真反省。健康保健，是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命题。当人们去捕捉具有新闻价值和吸引公众眼球的克隆人伦理争议问题时，却没有意识到健康保健这个最普通但又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存在必须有一个好的医疗和保健作为前提；与平民和大众分离或远离的新异问题尽管带有刺激性和戏剧感，但它们却不应作为我们倍加关注的现实。医疗公平是生命伦理学需要研究或讨论的问题的中心。可以说，没有宗教情感的学者经不住世俗话题的诱惑，也不可能获得冷思之后的思想成果。当然，传统基督教在处理拒绝治疗、过度医疗、器官移植、堕胎、身体增强术、给病人提供医疗辅助自杀以及对病人实行安乐死等病例时，其在心理矛盾和宗教信仰冲突中所采用的方法，似与医疗保健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却和世俗伦理一贯所持有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恩格尔哈特做了杰出的理论开拓。

基督教有关流产、杀婴以及人对死亡的操作等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有关使徒的记载。罗马天主教对于健康保健的思想有着坚固的理论基

础,我们可以回顾到几个世纪前。提涉此类问题,还有本书中其他的历史记载,都是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展现出来的。如同所有的历史记录一样,这里提到的话题也承担着本书作者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些关于现实的基本特征的假设或承诺才能从繁杂的事物中获得信息。每个人必须知道他大体要寻找些什么。任何一件事的确定都必须依赖人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事物。恩氏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从自由意志世界主义(或自由论世界主义)过渡到自由世界主义,并以自由世界主义稀释原有的所谓“公共理性”。超越“自由意志”的传统,实际上,就是从对道德异乡人的简单允许,过渡到去神圣化的自我决定,以及一切生命的自主的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并彻底埋葬道德“帝国主义”,建立个性解放的伦理机制,最终回归或再造一真全的理想天国。他精致地审视了当代世俗化医学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人对于身体康健和幸福快乐的期盼,从大公主义传统引导我们的政策方向,最后具体关照身体的现实利益和基督徒式的灵性救赎,这种巧妙俊美的构思,确是令人惊叹。视角有时决定结论。一段历史对某人来说是道德颓废的历史,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道德进步。关于生命技术和死亡问题的争论,如果用发展教义学的视角去判断和观察,我们也许就不再只知道指责和抵制;而会持一种平和的心理去考察问题: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些技术和手段可以解救人的生命,并作为健康事业的一个部分。当不同的历史记录承担着不同的伦理神学义务时,这种不同就像是物理上具有分歧的记录。恩格尔哈特举例说:“透过物理镜头,亚里士多德、牛顿和爱因斯坦眼中看到的宇宙是多么不同啊。”^①

恩格尔哈特认为,19世纪末期出现并在20世纪50年代风靡罗马的天主教医学伦理手册和道德神学概略与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一脉相承,并延伸到16世纪初期和西方科学的繁荣时期,这时的西方科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医学和它的基础科学。从16世纪向前看,文艺复兴后医学令人瞩目的进步,促动着道德神学也对医学产生了兴趣。鉴于对医学的信心,甚至连笛卡尔都相信他的生命能够延长。虽然医学带给人类的益处还没有所说的那么多,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人们稍后才能看到

^① H. Tristram Engelhardt, Jr.: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Bioethics*, p. 8.

治疗效果，这种知识的进步也是惊人的。科学和医学研究对医学新的说明改变了医学知识本来所包括的含义。

恩氏追索历史认为，相比之下，人们仿效特伦多主教会议（1545—1563）成立了一个和罗马天主教神学思想一脉相承的组织，它一直完整地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前经院时期到经院时期，罗马天主教道德思想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前经院时期是田园风格的，它的神学精神更接近于教会的第一千禧年精神。经院时期以散在的理性思维和系统化为标志，开始于12世纪并延续到特伦多会议时期。始于特伦多时期的现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经院的传统，并使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正是这个时期人们将所有工作都集中于对医学的思考，并形成了道德神学的子学科。特伦多主教会议以后的思想、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道德神学的思想都非常具有洞察力。它远远不是对以往思想的机械应用。罗马天主教医学伦理学思想和学识的重要特征是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连贯的研究团体。参与团体的人都要遵守一些共同的意见、假说、程序或法则。另外，他们对于谁具有道德权威去解决道德纷争有共同的理解。纷争时有发生，也的确在发生着，但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控制住自己。为了引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有关科学革命的隐喻，罗马天主教医学道德神学家采用了共同的范例。他们不理睬道德思想的危机问题，而对世俗道德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感兴趣，并因论争道德基础的不同而闻名。恩氏认为，我们不要害怕做出一些基本的假设，同时也要大胆自信地应用一些基本的原则。道德推理的大体框架和假设不但不会产生问题反而会激发人们去探询一些特殊问题，解决方法是基于对道德科学本质的理所当然的理解。我们会遇到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引起危机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罗马天主教才普遍开始了基督教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正如约翰·伯克曼（John Berkman）所说，从神学手册上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到道德神学的连贯性思想，1905年的手册上支持的基本思想结构和类型在1605年的手册上就出现了。道德神学的思想信心十足地足以回答新科技进步所提出的问题。如此透彻和具有穿透力的研究，在全球的生命伦理学界是罕见的；深思起来，这足使我们折服。

恩氏在独立的研究中注意到，其他一些因素也使得世俗生命伦理学